

※採訪報導※

從敦煌學到國際漢學的學思歷程

——柴劍虹先生訪談錄

車行健、程克雅 * 採訪整理

柴劍虹，浙江省杭州市人，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農曆端午）生。一九六一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一九六六年畢業。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市任中學語文、教師進修學院古代漢語教師。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回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研究生課程，專攻中國古代文學史，師從啟功、郭預衡、鄧魁英等先生。一九八一年畢業並獲文學碩士學位，由啟功先生推薦到中華書局工作，先後擔任文學編輯室編輯、《文史知識》雜誌副主編、漢學編輯室主任，現為中華書局編審、敦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先後應聘為浙江大學文學院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蘭州理工大學兼職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擔任《國際漢學》、《漢學研究》、《法國漢學》、《華林》等學術刊物的編委。從一九八一年起發表有關中國古典文學、敦煌吐魯番學、中西文化交流及西域文史的論文數十篇和散文、隨筆、書評數十篇，主要學術著作有《西域文史論稿》、《敦煌吐魯番學論稿》、《絕句一百首》（胡適選每日一首詩），主編《中國歷史寶庫》等書，參加了《敦煌學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和「音樂舞蹈卷」的編寫工作。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政法大學、杭州大學、山東師範大學做學術文化講演，並曾多次應邀赴法國、德國、俄羅斯、韓國、日本、臺灣與香港等地考察、講演及參加學術研討會。

柴劍虹先生專研敦煌學，對國際漢學亦有深入的接觸與掌握，甫於二〇〇四年下半年應邀至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講學，開設「敦煌吐魯番學概論」、「敦煌吐魯番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程克雅，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學作品選讀」、「敦煌歷史文化專題研究」等課程。為進一步了解柴教授的學思歷程與國際漢學概況，趁著柴教授參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組於二〇〇五年四月初所進行的晚清浙江地區經學考察的活動之便，柴教授接受林慶彰教授的邀請，由程克雅與車行健於四月九日晚間，在其下榻的杭州浙江大學西溪賓館做九十分鐘的訪談。訪談稿先由程克雅與東華大學中文所蔡衍廷同學做初步的文字記錄，再經車行健整理修訂而成，全文最後復經柴劍虹先生本人之校正。

程：早上的時候聽到柴教授提到高田時雄先生(1949-)，他在京都大學可以說在聲韻、古文獻或者是敦煌學方面都相當有成就，也很紮實。依老師足跡所到之處，類似高田這樣的國外漢學家，是不是可以請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柴：我過去對國際漢學並不熟悉，但是因為我從事敦煌學研究，所以總是感覺到敦煌學這個學問它本身就是世界性的學問，開始就像是西方一些國家，還有日本的漢學家，他們就很重視。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就會接觸到日本漢學界、西方漢學界很多專家，因此當然也就認識了一些漢學家，也了解一些漢學家對我們的一些認識。我這幾年跟歐洲漢學界聯繫多一點，尤其是法國的，日本的也有一些聯繫，給我一個總體的感覺，「漢學」——我的理解跟有些專家的理解也是一樣的，嚴格地講，我們指的國際漢學，就是外國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當然後來因為美國、日本不太願意講漢學，他們就講中國學，過去日本人講支那學，當然有些學者很反感。中國學的範圍就擴大了，包括中國當代的、近代的一些文化、政治、經濟也都研究，但是我覺得傳統意義上的漢學，指的是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問。

車：現在所謂的中國學是比較接近區域研究？

柴：對！是這樣子的。它有一個過程，比如說西方的、歐洲的這些漢學，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比較興旺發達；二戰以後，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有一點走下坡，而二戰以前當然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比如說敦煌學，因為敦煌的很多材料、文獻流失到他們那裏，他們得天獨厚，中國的學者反過來要到他們那裏調查、考察，條件不太方便。像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英國的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瑞典的斯文赫定 (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 等，當然他們本身也很用功，另外，他們也擁有新資料等條件。二次大戰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受到戰爭影響，總體來講，二戰以後，歐洲漢學逐漸走下坡。但是二戰以後，日本很奇怪，由於他們戰敗，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因為他們戰敗，促進一大批日本的年輕學者更加努力地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日本漢學界應該是在五、六〇年代以後，經過比較努力的研究，也有很多成果。剛才提到歐洲的儒蓮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伯希和、斯坦因、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及稍後的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1894-1979) 等，這些都是老一代的，當然他們有很多成果，但我為什麼說二次大戰後反而走下坡？大概這些人都是在二戰或者是二戰以後逐漸去世，當然他們也有很多弟子很努力，比如說我接觸過法國的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他做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中國法制的研究，這些方面都非常努力，也是非常好的學者。年輕一點的像是法國的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漢學研究所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所長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1944-)，他研究中國的官箴、水利，像這些他都非常用功，再加上他跟美國有比較密切聯繫的背景，英文也很好，這些年他時常到中國來，跟中國學者做一些交流，所以他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說像法國戴仁 (Jean-Pierre Drège)，原來博士論文是研究上海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後來研究敦煌寫卷，研究得也很好，現在又研究中國的印刷史，做得不錯。前一些年他做了法國遠東學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 院長，現在他已經卸任了。再年輕一點的，我認識一位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的研究員戴廷杰 (Pierre-Henri Durand)，他的博士論文是《士與權》(Lettrs et pouvoirs Un procs littraire dans la Chine impriale, 1992)，就是文人和權力，通過這個博士論文，他就對戴名世 (1653-1714) 很感興趣，他的中文是在臺灣學的。他發憤編著《戴名世年譜》，用了十幾年的功夫，不斷地到中國各個圖書館調查資料，而我們也幫他忙，差不多十二年，終於在去年出版，完全是用古文寫的，他跟我交流，中文並不是很好，可是他看古文看得很好，標點等各方面基本功很好，這個很了不起，最後出了九十萬字的《戴名世年譜》，完全用中文寫的，所以法國很多漢學家都非常羨慕他。最近河南鄭州大學文學院的高黛英副教授通過電腦採訪他，寫了一篇訪談錄，寄給我看，非常有意思。

車：那一篇訪談錄是否有發表？

柴：還沒有發表。（行健案：訪談記錄後來以〈法國漢學家戴廷杰訪談錄〉為題，刊載於《文學遺產》2005年第4期。）

車：聽柴教授說戴廷杰把《戴名世年譜》燒在戴名世墓前，這一段是否可以請柴教授再講一下？

柴：那一年他全家要我陪他們到安徽桐城，因為他聽說，一方面是戴名世墓在那裏，一方面是桐城戴名世後裔保留有戴氏家譜。他預先訪得戴氏後裔戴應祥，他在那裏擔任中學老師，答應提供給他戴氏家譜的複印件，他非常高興，所以他就去了。我們去了以後就掃了墓，當時也是春末夏初的時候，油菜花一片金黃。他就跟我講：「柴先生，我寫出這本年譜，出版以後，我應該到這裏來，燒給戴先生。」我說：「那很好，你來，我一定陪你來！」當時我答應他，這本書去年出版了，當然他要來還願。有人就問他：「你是不是也姓戴，你們有什麼關係？」完全沒有！他是一個法國人，他叫戴廷杰是別人給他取的名字，他就是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我們看到一批漢學家，在研究之前並不一定對中國文化很熱愛，但在研究過程中慢慢產生感情，戴廷杰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娶的妻子也是中國人。另外，我還認識一位德國特利爾大學 (Universität Trier) 漢學系系主任卜松山教授 (Karl-Heinz Pohl, 1945-)，他曾譯有《陶淵明集》，也譯出了李澤厚先生《美的歷程》，一九九三年他請我赴特利爾大學為漢學系學生演講「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比較」。說實話我對二人並沒有很好的研究，但他希望我講這個題目，所以我將講題訂為「籠中鳥與出籠鳥」，我認為陶淵明 (365-427) 是可以飛出鳥籠外，在那一個時代，雖然文人也不自由，但是到最後他真的可以自由；但是宋代的文人就沒有那麼自由，蘇東坡 (1036-1101) 不管當官的時候也好，烏臺詩案也好，犯罪貶謫也好，他都是逃脫不了朝廷掌控的牢籠，這是宋代文人的悲哀。一九九七年我又赴特利爾，為漢學系學生講了敦煌的飛天。卜松山對中國婦女問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互動比較有興趣，甚至對毛澤東詩詞他都很有興趣，後來我鼓動他出版

論文集——《與中國作跨文化對話》一書，有李澤厚寫的序，所以他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漢學家。

我在認識漢學家的過程當中，看了一些書，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國外漢學不是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我剛才所講的一些老一輩或者是中年一輩比較好的，有一個特點，他們的漢文字、語言文字修養打得比較紮實，如伯希和這樣的語言通才。現代歐洲漢學系培植年輕學生，面臨兩個嚴重的問題，一個問題是他們學漢學，畢業以後找工作、找出路很難，家長就不太願意他們學漢學，因為他們覺得學習漢語可以，對於將來做生意還行，但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他們就怕沒有出路。如同我們一樣，他們政府對於研究中國當代資助很多，研究古代就不是很重視。第二個問題是他們的基本功，學習的時間、經歷還不夠，對於中國典籍的閱讀能力不足，卻不影響他們做碩士、博士論文。一九九七年我在德國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與漢學系師生座談，我說：「你們現在有一個比較危險的問題，就是打井式的危機。老一代的漢學家是打地基的研究，地基打得很紮實，他的房子可以蓋得很好；現在的漢學家往往是打井，他的知識面比較窄，打得並不紮實，但是他鑽一個洞，不斷地往下挖，他也可以挖出水來，汲出水來也能寫成一篇博士論文。如此造成一個現象，例如他做唐代李白 (699-762) 的博士論文，可是卻不了解王維 (699-759)，這個在過去是很難想像的。」所以這樣就局限他們在漢學上的發展，他要進一步發展就有困難，而這樣的漢學家多了，對於漢學的發展並沒有好處。

車：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不管是臺灣或大陸，我們所接觸到的幾乎都是如此，大都是限制在一個小的領域。

柴：是的。所以後來我也做了自我批評，即是：我們大陸的一些研究人員也開始是挖井式了，這是很不好的。我當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啟功先生 (1912-2005) 他專門講過這個問題，他說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不是燒魚，烹調魚可以分成魚頭、中段、尾巴，而研究中國文學，分段帶研究生，常常說我是研究唐代文學的、宋代文學的、元代文學的，這個東西並不好。就是研究唐代，還將它分成初、盛、中、晚，這樣研究很不科學，並非是這個皇帝誕生，而文

學家也誕生，皇帝崩殂，文學家也隨之死去，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研究不能像是烹飪魚一樣，文學的血脈是相連的，怎麼可以切成一段段？所以啟功先生就講，如果要學中國文學，就應該從先秦至明、清都能夠講下來才行，只能講唐代文學，先秦不熟悉，那是不行的。所以在大陸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做先秦文學的愈來愈少，因為他們覺得先秦的難度大，研究唐、宋、元、明、清的愈來愈多，好像明、清小說大家都讀得懂，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其實，沒有先秦作為基礎，後面也研究不好。所以大陸和臺灣也是有這個問題。臺灣和大陸的碩士、博士論文就是愈來愈專、愈來愈深，但是很窄，互相的聯繫比較少。國外漢學界很同意我這個觀點，但是他們無可奈何。我在洪堡大學座談會指出這一問題之後，當場系主任及同學即要求我開個書單，我說最起碼的就是《四書》、《五經》、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這是最基本的吧！但他們現場就叫起來了：「這怎麼讀？讀不進去呀！也不好讀。」如果連這些基本書都沒看過，怎麼能成為一個漢學家？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提到高田時雄，同時讚賞他的原因。高田他是一個語言通才。他通多國語言（包括法文、俄文、義大利文、中文）、古代語言（古漢語、梵文、藏文等），這對他做學問有很多好處，當然在日本這樣的學者也愈來愈少。所以大陸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的人才也愈來愈少，而德國是有這個傳統，做得也比較好一些。我始終有一個想法，我曾參加在日本召開的「草創期の敦煌學」研討會（2001年11月27-28日，京都大學），寫了一篇〈王國維的初期敦煌寫本研究〉。我提出了一個觀點，那就是國際漢學研究的發展已經愈來愈離不開中國學者和海外漢學家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就是中學興，西學也能夠興，過去王國維（1877-1927）就明確提過這樣的觀點。

我這些年來致力於成立漢學編輯室，要多翻譯國外漢學家的著作到中國來。國外的漢學家寫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著作，得不到中國學者的反響和評價，意義就削弱了一大半。過去一些著名漢學家寫過很多很好的著作，比如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唐代長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聶鴻音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出版），這在過去沒有中譯本，中國研究語言學的很少懂法文，研究中國古代語言學，他也不學法文，作者寫了半天，就給幾個外國人看。伯希和寫了《卡爾梅克史評注》（*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耿昇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其中運用了很多清

代人的西域史料，也運用了多種少數民族的文字，法國大使親口講這本書法國人都不看，法國人都看不懂，可是中國人又看不到。所以後來在我那裏出版，法國大使就跟我講，你們很了不起，我們法國人都看不懂的著作，你們翻譯成中文出版。這些老的、很有名的漢學家的東西，我們過去都沒有好的中譯本，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現在新一代的漢學家，他們也有很多好的新的東西，但是我們也沒有翻譯成中文，中文學界也很少去交流，所以他們也感到很遺憾。當然現在問題很多，要翻譯很不容易，懂學術的不懂外文，懂外文的不懂學術，所以我們這幾年漢學編譯做得比較辛苦，當然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只有這樣的交流，才能夠促使學術的發展，進而促進漢學的發展，也能促進我們國內學術的發展。因為漢學研究和我們的國學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儘管研究同一個題目，研究黃宗羲(1610-1695)，法國人研究黃宗羲，日本人研究黃宗羲，跟中國人研究黃宗羲，一定是有差別的，因為文化思維、視角、方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漢學有很多東西，我們是可以借鏡的。我是很羨慕臺灣的同行，臺灣的同行有兩大優勢，第一大優勢是外語的優勢；第二個是交流資料的優勢，因為大陸在五、六〇年代比較閉塞，所以跟外邊交流有些問題。

車：柴教授您提到的這二點，因為我們也是臺灣中文系出身的，我覺得我們臺灣中文系並不是如此，不但外文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好，跟國外漢學界的交流也不夠理想。這十幾年來有比較大量接觸大陸的文史資料，但是也僅及於此，對於西方漢學、日本漢學大部分也是依賴翻譯的東西，所以這是一個問題。我覺得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中文學界出身的，其實都面臨到其他學門的競爭和壓迫，比如說歷史學門的、哲學學門的，或外文學門的，他們的外語能力其實都比中文系的強很多，而且他們也大多數都有出國留學的背景，他們去西方接受了教育之後回來，他們也是一樣研究漢學的東西，或是傳統國學的東西，他們研究的方法或是思維，還是跟我們中文系有很大的不同。現在臺灣的學風是西風壓倒東風，其實現在是朝著國際化，向歐、美看齊的路子，所以他們研究的成果，或是他們的資源，他們所受到的待遇跟重視就遠遠超過中文系，而且我相信這趨勢將來更是如此。我覺得這對中文系會有危機，也就是漢學或是國學應該是中文系最擅長的一個部分，可是現在整個研究的重心或是成果，好像中文系都逐漸喪失優勢。

柴：你所講的非常符合客觀現實，但是這種危機實際上也隱藏了另一種危機，這另一種危機，我舉個例子說明，我一月在史語所做了一個演講，王汎森所長跟我談了一個事情，他說史語所有很多老一代史學家的信札沒有人整理，他問我有沒有辦法幫忙，我說「很難」。為什麼？因為有普林斯頓背景、有哈佛背景的學者，他不會下工夫去做這個，他願意花時間也未見得做得了，所以我再借你一句話，我們不要丟掉我們的優勢。我剛才強調，我們中國人研究傳統文化有我們的特點和方法，當然我們要借鑑西方的，但西方的只是借鑑，而不是代替，如果我們都是用西方的方法，完全代替了中國的傳統，那麼這就很可怕了。

車：在我們臺灣現在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或是現代文學研究，你不用西方理論，你這篇文章就很難引起學界的興趣。

柴：我知道。我這次在文化大學時，我也跟他們博碩士生談了，我說我也看過你們臺灣許多博碩士論文，剛開始的時後，我覺得有的還比較新鮮，後來我就反對了。我在中正大學演講，我跟他們專門就講這件事情，比如說數字統計，一開始我還覺得比較新鮮，可是看多了我就反對。你研究詩歌，你一定要把詩裏面出現多少「風」字，多少個「月」字，多少個「雪」字統計，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我們是學文學的，對不對？我們學文學的是形象思維的東西，對不對？我過去開玩笑，說賈寶玉坐在床上和賈寶玉斜躺在床上，當然你可以說有不同，對不對？但是你一定要把這種東西去當作文學的研究，恐怕沒有多大的意義，意義不大。我看到臺灣的論文，有一段時間就熱衷引進這種數字統計法，沒有多大的意義，我反對這種方法用得過濫，不如你就自己開創自己的新東西，對不對？

比如說，我就跟他們舉例，我說現在你們中文系的人沒有一個去做隋代文學研究的，雖說隋代是個短命的時代，就兩個皇帝，當然有人說還有個小皇帝，三個，就幾十年的時間，可是隋代的文學很有它的特點，藝術更有它的特點。你到敦煌去看壁畫，一看就知道哪個洞是隋代的，這很奇怪的，幾十年就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我們現在做得到嗎？比如說，我們一個國家成立了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能形成自己的風格嗎？沒有！這就很值得研究，而這個東

西可不可以借鑑西方的呢？西方有東西是可以借鑑的，比如說，我就講到敦煌學的研究，敦煌學的研究為什麼我們講是世界、學術的新潮流，王國維他們講的，陳寅恪先生(1890-1969)講的，就是因為他們把東西拿走以後，研究的視角、方法不同了，有一些西方的東西在那裏，是什麼呢？比如說，他對卷子的分析、紙張的分析，像戴仁研究這個東西，另外謝和耐研究法律，他會把中國文書裏頭出現的法律和西方的法來做比較，他這個研究往往比我們要寬泛一些，因為它有一些比較的東西在裏頭，這東西都是可以借鑑的。但是有一些起碼的條件，他要研究你這個契約，他要讀得懂你這個契約，如果他把你這個契約本身都讀錯了，在那裏研究了半天，我可以說價值不大。

我舉個最典型的例子，有一年我們敦煌開了個國際會議，有一個日本的學者在會議上提了一篇很長的論文，大概有將近兩萬字，兩萬字的論文講什麼呢？敦煌出土的文獻裏，有一個敦煌的廿詠，就是敦煌二十個名勝古蹟的詩歌，他要考證這些詩的時代背景，他用了很多考證分析。你們知道日本人引證的資料比較繁複，很細緻，如果這篇文章我來寫的話，兩千字、三千字就解決了，可是他寫了將近兩萬字，你聽起來很厲害，最後他說那個詩是初盛唐時期的。他剛講完，四川大學的項楚教授和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研究員馬上就舉手說：「對不起，其中有一首詩寫到一個人，可則，譚可則，這個人是五代時期的！」這個日本學者當時臉就紅了，不能說話了，因為你考證的是初盛唐的，怎麼初盛唐的詩裏面會出現五代人的名字呢？為什麼？他不知道譚可則，這個日本學者他不知道。這篇論文就作廢了，所以這是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當然我不是批評這個日本學者，任何人都可以犯錯，日本學者不知道這個人不是他的恥辱，但是另外一個方面，這又說明一個問題，如果他沒有讀懂中國的基本東西，讀懂中國的詩，不知道這個典故，就很危險。不是中國學者不犯這個錯，中國學者也有犯這個錯，所以這個問題就是我覺得國際漢學研究現在面臨了一個問題，現在外國的漢學家非常厲害，他們要加強跟中國學者的交流，雙方交流得愈多，那怕是受到中國學者的批評，他們都會很高興。第一，他們的觀點有中國學者的關注；第二，他們的觀點可以有被糾正的機會，可以有被人評價的機會。

所以我現在強調，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外文化更加好好交流的一個時代，現在這個情況我就覺得，像林慶彰先生他們做經學研究的論著目錄，就是非常

好的事情，讓我們知道誰寫了哪些文章，到哪去找這些文章，這樣就有了更好的互相交流的可能性。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我剛才講到的，比如說我們流失在歐、美的這些文獻，包括流失在日本的，過去因為交流不容易，中國人要到歐洲去談何容易，去調查敦煌卷子，所以當時像王重民先生(1903-1975)、姜亮夫先生(1902-1995)、向達先生(1900-1966)，他們很節衣縮食，姜亮夫為了看敦煌卷子，把眼睛看到高度近視。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很快就能出版，全世界都看得到照片，相應來講，我們中國人應該有更好的成績，外國人也會得到與中國學者更好更多的交流機會，這樣子比較好。當然我接觸到的國外漢學家還不是很多，因為我本人是中文系，而且是學文學出身的，也有很多局限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因為這幾年是研究敦煌學的關係，跟這個學界聯繫多了一些，當然敦煌學本身因為它牽涉到很多學科，歷史學也好，政治、經濟、軍事、語言、藝術也好，所以那時當然也聯繫了這一方面的專家，但總體來說，我所認識的漢學家非常有限。所以我說的現象，它只是我通過這個東西，我想到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值得重視。我曾經在《國際漢學》上發表一篇文章叫做〈漢學研究的兩個隱憂〉，埋藏在後面的可憂慮的東西，就是我剛才講的。所以我就提出來我們要加強，臺灣也是一樣，我們同是中國的，海峽兩岸的學者之間，過去交流也是很不夠，今天林先生演講完以後，我又補充他講的，我是非常佩服林先生，因為在八〇年代那個時候，我們兩家合作，能夠打破很多障礙，一個是兩家雜誌同時出了「臺灣專號」，後來又出了「胡適專號」。要知道在那個時候，出胡適專號是很勇敢的行為，因為那時候對胡適的評價，還沒有像現在那樣，稍微更客觀一點，這是一個；第二個是當時《國文天地》買回去一大批大陸學術著作，十幾萬冊，搞得臺灣當時很緊張，警察都來干涉，這個林先生他們是有很大的功勞。

這個好處在什麼地方呢？好處就是文化學術的交流，就不是表面上的交流，禮尚往來，中國人很容易做到，實質性的交流很難。所以我是贊成大陸的學者應該多去臺灣做一些交流，臺灣的學者也應該多到大陸來，我也開玩笑地在臺灣講，我們現在還不是對等的，臺灣學者來得多，大陸學者去得少，當然這個是有更多具體原因，實際上還是應該更多的做些交流。大陸的學者到臺灣開會，非常緊，四天、五天、六天，馬上就回來了，根本就沒有一個很充分交流的機會。我曾去臺灣上了一學期的課，我可以稍微充分地交流，到一些學校

演講，做些介紹，但是這還不是多數嘛！所以我是希望這一方面能多做一些。今天林先生所講，我是非常注意的，就是他在座談會上講到，他編這些目錄，還編西方的一些論著，我非常高興這件事情，因為在這一點上，你不管誰做，比如你剛才說臺灣的中文系在外語能力上跟大陸有些類似，但是不管怎麼樣，臺灣整體的英文水平比大陸要好一些。所以像這些我們最近在做的工作，也是我跟高田聯絡的，我們已經翻譯好了伯希和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1922)，後來高田寫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1997)，我們現在把伯希和的《原目》和高田的《補編》放一塊，我請南開大學一位碩士畢業生，她現在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因為她是學法語出身，而且我是她的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她做的是伯希和的研究，所以我就抓住了她，就請她幫忙翻譯。今天下午在座談會之前，我到他們浙大古籍所辦公室上網，收到高田給我的一封電子郵件，說他已經收到了譯本。因為裏面還有一些義大利文，這些義大利文譯者不懂，所以譯者要請教高田，因此還要再寄給高田，請他再看一下。你們知道我前幾年出過一本《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Catalogue annoté des ouvrages chinois rares conservés à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田濤主編，岑詠芳、王家茜助編、魏丕信監修，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出版)，那時剛好是我在巴黎，政法大學的田濤先生也在那裏，他徵求我的意見，我支持，最後我們就出版了。所以像這樣的東西，就是應該多做一些實際的工作，臺灣這一方面的條件應該要比我們好一點。

車：現在中國大陸年輕的學者出國的機會愈來愈多，相較之下，臺灣因為邦交關係，所以國外大學的獎學金比較不會給我們，我們要的話，就是自己要自費，或者自己另外想辦法，可是中國大陸就很容易申請到國外大學的獎學金，所以他們出去的也很多。

柴：是！因為大陸畢竟人口也多，十三億人口嘛！你想那麼多大學生、研究生，出去的人數肯定是不少。

車：在臺灣除了中研院、臺大、師大與清華大學等比較知名的學府或機構，還比較會有一些知名的國外大學提供交流訪問的機會，如哈佛燕京學社或是像荷蘭萊頓大學。但對其他的大學來說，一般來說機會是較少的，除非這個學校本身有跟其他學校進行學術交流的計畫。

柴：我知道。我這次在文化大學講學的時候，我開的一門課是「敦煌吐魯番文學作品選講」，有博士生是從政大什麼所轉過來的，這個學生比較內向，一個男孩，就他一個人選我的課，後來又來了幾個碩士生旁聽。這個博士生在聽我的課之前，對敦煌文學完全沒有了解，但他非常認真。後來我就跟劉兆佑教授建議，我說你們要給他創造條件，最好讓他出國進修，因為這個孩子很本分，很老實，如果他自己不爭取，恐怕人家也不會想到他。但是根據我的觀察，這一個學期課上下來以後，我讓他做了三次報告，非常好的作業，你要看他好不好是什麼呢？他原來的基礎是什麼，他聽了以後很快入門。

程：可不可以請問柴老師，三次不同的報告研究什麼？

柴：他沒有接觸過敦煌文獻，卷子本身也沒有標點，先請他整理一篇，他做得很規範，而且對以前做過的，他也掌握了一些資料，提出不同的意見。後來我又讓他做更多一點的文學作品的材料分析，比如說讓他標點整理、注釋、研究敦煌的古小說，他做得也很好。比如說我講到敦煌寫本《黃仕強傳》，我說我寫過文章，你去看！他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就很好。同樣的《黃仕強傳》，我讓史學系的碩士生、博士生也做，結果史學系的碩博士生（當然也有很認真的）在思想分析這些方面不如他，而史學系的碩士博士生，在我去之前已經聽過敦煌學的課。他上課的時候很認真，拿著筆記電腦一面聽，一面把我講的記錄下來，後來我說我想看看到底你記錄得怎麼樣？我說等我回來以後，你把你的筆記傳發給我。他前不久發過來，我還沒有仔細看，但確實做得很認真。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應該給臺灣的學生，或者是後來做了年輕的講師、副教授這些人，給他們創造出去交流的條件，當然有些東西是我們解決不了的。

程：柴老師，我還有一個很好奇的疑問，就像現在學生沒有看得懂原文的能力，但

他可以看翻譯，可是如果在西洋或是域外的環境裏頭，譬如說《趙氏孤兒》是最早翻譯成法文的，那他們是不是也依賴著漢文的語譯去讀一些翻譯過後的東西？這些東西反過來我們在看的時候，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意見，比如說像之前有一個石磊，他就翻譯《中國思想名著選讀》，我在給英文系學生上國文課的時候去討論，學生有很多不同意見，那裏面就涉及比如說《易經》、《詩經》、《老子》這些英譯的片段，英文系的學生他們的感覺，或者是他們對語譯的認識，覺得很多翻譯不妥當，所以從早期的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或者是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1946-) 的翻譯，老師您看到的譯著有沒有覺得可以批評的地方？

柴：我沒有學過英文，這是非常遺憾的，我那個時代只學俄文，但是前不久我做過幾次演講，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舉一個例子，當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 (Georg W. Hegel, 1770-1831) 居然說中國古代沒有哲學，為什麼？他就是看了他那時代漢學家翻譯的《論語》、《老子》、《孟子》這些東西，翻譯中問題很多，那個時代的翻譯既有正面的效果，也有負面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就是妳剛才所講的，譯者並沒有讀懂中國的原著，便把它翻譯成英文、翻譯成拉丁文，外國人去看英文、拉丁文的這些中國作品，就產生很多的誤解，他們認為老子的思想就是這樣子的、孔子的思想就是這樣子的，其實他翻錯了、理解錯了，所以有負面效應，這個負面效應不能夠低估。

因為我們現在老把漢學研究分割成好幾個階段，什麼初始、原始階段，後來傳教士階段，成熟的漢學期階段，尤其是傳教士那個階段，翻譯相當大量的作品，包括妳剛才所講的《趙氏孤兒》，當然我也不懂法文，不知道他的《趙氏孤兒》是不是翻譯得對？我跟妳舉一個小例子，妳就知道了，就是饒宗頤先生 (1917-) 和戴密微先生合寫過一本《燉煌曲》，翻譯了很多敦煌曲子詞，一邊是中文，一邊是戴密微的法文，後來我們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老先生任二北 (1897-1991)，任半塘，就為這個事情罵饒宗頤、罵戴密微，說你們這個不對，為什麼呢？很簡單，就是因為法文的敦煌曲子詞，把中文的敦煌曲子詞翻譯成法文了，任二北他又讀不懂法文，他就請懂法文的人，把法文再翻譯成中文，那些詞就不知所云了。這裏面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你不知道他理解的是什麼東西，為什麼？我們中國前陣子不就為了馬勒 (Gustav Mahler, 1860-1911) 的

〈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到底是李白哪一首詩弄不出來,為什麼呢?他肯定是翻得不對。

我今天在林慶彰先生講演以後,就舉了個例子,比如說俄國有一個漢學家,他寫了一本有關夜叉的書,佛教的夜叉原來在印度佛教裏面並不是惡鬼,祂是一種小的護法神,梵文叫 Yaksa,所以中文把祂翻成夜叉或者藥叉,因為梵文有很多變格變位。到中國以後當然改造了,變成惡鬼。後來封建衛道士有意要污衊婦女,所以又變成了母夜叉,說這個女的很凶惡,就說她是母夜叉,這當然又是改造過的。結果我看到一個俄羅斯學者的翻譯,他怎麼寫?「Аемонов Ночи」,什麼意思呢?夜裏的鬼,晚上的魔鬼,或者叫夜裏的精靈。夜叉,他就用這個「夜」去理解,他不知道「夜叉」是音譯,它變成意譯,你要介紹這個東西,俄國人去看,他以為夜叉就是這個字。《紅樓夢》裏面,俄文的《紅樓夢》叫「Красный Аом」,就是紅色的房子,或者叫「Сон на красном Аому」,就是在紅房子裏的夢,這個還湊合,但已經完全沒有原來的意境。外文著作裏面翻譯林黛玉,你知道翻成什麼嗎?「黑色的石頭」,鴛鴦這個丫環翻成「忠實的天鵝」,天啊!這人的名字,你寧可翻成「Аай」,你翻成「黑色的石頭」、「忠實的天鵝」,外國人莫名其妙,怎麼這個人取這樣的名字?這是人啊?所以現在需要什麼呢?現在大陸正在出一套書叫做「大中華文庫」,「大中華文庫」的宗旨是什麼?就是比如說《孟子》,他要請最好的人把《孟子》翻成白話文,然後再把白話文翻譯成英文,就是想糾正外國人過去翻譯不準確的地方,最近他們又找我,因為英文的已經翻譯若干本了,《論語》……什麼都有,現在又想翻法文了,我協助他們找法文的譯者,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像妳剛才講的,我們對他們的很多翻譯是不能夠苟同的,當然妳可以講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思維觀念,但另外一方面卻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完全讀懂原著,或者說他們有很多誤讀的地方。所以我曾經講過,他們外國人也承認,我說:「我們不迷信,我們可以學習你們的很多好的東西,但我們也不是說你們的東西就一定好,你就是到哈佛留學一年,認識一個美國很有權威的漢學家,也未見得有太大的收穫。」這個問題就是這樣,當然日本漢學這一方面的缺陷稍微少了一點,因為畢竟它是屬於東亞文化圈的。但是清水茂先生(1925-)也舉過這個例子,比如他講的「綠」、「青」這些顏色,翻譯詩歌時,「青山」該怎麼翻?「青天」該怎麼翻?「青天」當然是

blue sky，翻英文的話，藍天嘛！它不可能翻成綠天。可是「青山」的「青」一定是 green，一定是綠色的山才叫青山，不可能是藍山嘛！

程：所以它這個涉及到詞彙組合結構的理解，就是中文的詞義它是很緊密的，比如說像「黃泉」，它不能拆開變成「黃的泉」。

柴：但是還有一個情形，即同一個「青」字可以翻譯成不同的顏色，所以阮籍(210-263)作青白眼，這個「青」既不能翻 blue，也不能翻成 green，應該翻成 black 黑色的，所以他舉這個例子很有趣，就是同樣這個「青」字，你翻譯的時候，要看你理解得對不對，你翻譯不對，那就鬧笑話了！你翻譯青白眼變成 green 或 blue 的話，那就變成外國人藍眼珠了，都不對，所以我當編輯這些年來，我是非常頭疼，因為我外語不好，我也沒有好好學過英語，所以有時候我審稿子也很困惑，得請人幫忙，現在年輕的編輯要好一點，因為他們外語學得好一點。但是我也警告他們要特別小心這些問題，對外國人很多東西，你還要做很好的分析。

車：柴老師，我們剛才講到這些漢學，基本上都是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東西，叫做漢學。我有個疑問，就是有很多留美、留日、留歐的學者，他們在那裏住了已經幾十年了，他們在那裏受的教育、也接受那裏的思想文化觀念，他們寫出來的漢學研究著作，我們在定義上是要把它們算是漢學，或是一般中國人的著作，比如說像余英時(1930-)、孫康宜(1944-)，或者夏志清(1921-)，他們的著作在臺灣、大陸的影響都非常大，他們原來可能都是用英文寫的，後來翻譯成中文，那這些東西在概念上，我們應該把它們算是國際漢學或是中國學者的學術成果？

柴：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不看他人，看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如果用的是西方人的方法，那種思維特點，那種視野，當然可以視作西方漢學著作。

車：那語文算不算是必要條件？

柴：語文，算，但這因素不是很強。

車：像我們剛剛提到《戴名世年譜》，他用古文寫的，而且很多思維都已經很中國化了，但他是外國人。

柴：不一樣，你別看他用中國古文寫，他思維還不是中國模式。

程：又如日本學者橋本秀美呢？

車：對！像北大的橋本秀美，他根本就是討厭當日本人，他希望自己就是中國人，講的還是北京腔的中國話。

柴：對！就是像這樣子。所以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要看他的作品，我們最近又碰到一個這樣的問題。我出了一套《世界漢學論叢》，其中有兩本是美國的華裔學者寫的，我就看他用什麼方法，他如果確實符合一般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學問的特色，則可以把它放在國際漢學著作裏頭。

車：現在很多臺灣、香港、大陸學者用英文去發表，也許他們的思想觀念全部都是來自於西方的，像這樣子的人，他們的語文已經是用外文發表了，思想觀念也用別人的，那也可以算是漢學？

柴：不！這裏面就有一個問題了，因為他們還是中國人，不是華裔，國籍還是中國，這就牽涉到我剛才給漢學定的一個定義。

車：像新加坡人寫的也算是漢學？

柴：應該算是漢學。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這個是基本定義。

車：這個定義跟我們去講文學，所謂華人文學或是華語文學又不太一樣。

柴：是不太一樣！因為華人文學或者華語文學，它的涵蓋面更大，它就可以包括多種方法，只要是華語的、華人的，都可以把它弄進來。比如說像陳慶浩先生，他收集域外的小說，韓國的、日本的、越南的，用漢文寫的，他可以把它放在這個範圍裏。

車：那像有些華裔美籍作家所寫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寫的，這種到底要算是美國文學或是華人文學？

柴：我們開玩笑說，這就是「兩棲文學」，都可以。不是高行健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嗎？他當時已經是法國籍了，也可算是法國文學，可是我們讀了，結果還是道地的中國文學。

車：跟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一樣，他是捷克人，卻用德文去寫作。

柴：對。這方面也並非一定要有太嚴格的界限。有一些中國年輕的學者，他們現在有很多交流的條件，外語也不錯，但是他們就是忽略了國學的基礎，其實這樣影響非常大，當然你跟外國交流，你得到了很多很好的東西、吸收一些東西，但由於你國學基礎不好，你丟掉了很多自己有優勢的東西，就很影響了你自己的學問。大家知道北京大學有一個年輕的學者，還已經做到教授，又是博士生的導師。他別的問題不講，他翻譯了一個作品，把孟子翻成了「門修斯」(Mencius)，他說有一個聖人叫做門修斯的說過「天上沒有兩個太陽，老百姓沒有兩個國王」，實際上這是外國人講孟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後來我在給全國「古籍編輯培訓班」講課的時候，我舉了這個例子，他有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如果他是照外國人這麼直譯過來的，首先外國人就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這個話不是孟子講的，是孟子引用孔子的話，這個外國人把孔子的話刪掉了，孔子的話變成孟子的話，這是他的錯，那麼這個教授他又不知道這個錯，而他又把孟子翻成門修斯，就犯了兩個錯誤。我當時講課時，我是講這位北大教授的書稿如果碰到一個好編輯的話，他就不會犯這個錯誤，就可以幫他堵住這個錯誤，恰恰這個編輯可能又不太懂這個東西，所以就出了這個洋相。因此我們作為一個中國的學者，我覺得首先還是應該打好國學的基礎，在這一

點上，中文系的學生、中文系出身的應該是有優勢的，所以中文系也不要因為自己外語不好而氣餒，我覺得我們要把握住這點，你要知道現在中國大陸中文系畢業生找工作比史學系要好找。

車：臺灣也是這樣。

柴：你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你對中國的這些東西，包括自己本身、民族的、本國的這些文化，都掌握得很差的話，怎麼能想像你能做出好的學問來？很難。外國學者也是這樣，比如說德國的、法國的漢學家，他中文寫得很好，德文很差、法文很差，你可以想像嗎？很難想像，更何況中文和西文還不太一樣，因為中文本身文字、語音都帶有文化的內涵，它不是字母那種東西。所以我這次在臺灣講課的時候，我是非常強調這個東西，我希望臺灣的年輕的學生一定不要受到什麼亂七八糟政治的干擾，你好好就是把自己的漢語文字搞好。因為我很生氣，我在那個史學系三年級、四年級那個班，期中考試，我講了半個學期的敦煌，有學生把「敦」字都寫成「郭」，很多錯別字，有些字寫得我都看不清楚什麼東西，還用好多日本漢字。我就很生氣，當然後來期末考試的時候，我說你們要再這樣可能很難及格，後來許多人就認真了。但是我發現連拿筆的姿勢都不對，後來我就問他們，你們字為什麼寫得這麼差？當然一個練得少，現在都打電腦；第二個你們從小學開始拿筆的姿勢都不對，史學系好多拿筆都這麼拿！（動作）這怎麼能寫好字？當然大陸也是有這個問題，小學、中學老師連拿筆的姿勢都不糾正，這個問題也是很大。

車：有些老師本身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在他們受教育的時候，老師就沒有很好地糾正他們，或是當時就沒有注重這種東西。

柴：是！所以我想，不管研究國際漢學也好、自己中國國學也好，立足點還是一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東西，這個基礎一定要打好，我過去在五年、八年以前，很高興臺灣在傳統文化的教學各方面應該都還是不錯，從小學課本開始，十幾年以前我就覺得臺灣的小學課本編得還不錯，但是我現在就覺得也不太好了。我舉個例子，十幾年前、二十年以前得到臺灣的小學課本以後，我看了很高興，

第一課寫的是幫助一個老爺爺推車過橋，我說很好哇！中國傳統的美德，當時因為大陸講階級鬥爭，已經沒有這些東西了，過去小時候我們學的是什麼，「開學了！開學了！見了同學問個好，見了老師敬個禮」。這是我們中國傳統的美德嘛！後來就沒有這個東西了。可是現在我到臺灣去，發現這些年也差不多沒了。

程：這些教材我們以前都會有一些，如蔡順的拾桑椹啦，然後還有秦晉崤之戰，弦高犒師那一段。

柴：所以，我們不能丟掉自己優勢的東西、好的東西，當然這在文化交流當中，在時代變遷動盪當中，有些糟粕進來是免不了的，中國大陸現在一樣，往往有些好的東西沒有學來，糟粕的東西引進了，這個也難免，但是不能長久，你總要辨別哪些是我們該學的？哪些是我們不該學的？所以我是特別不贊成，在大陸我的很多學生，他們的孩子初中、高中就出國去，我非常反對！

程：小留學生。

柴：你自己中國國學的底子，都還沒有打好，對不對，出去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車：我們現在已經是托兒所這階段就要送小孩子去學英文。

柴：大陸也是一樣。

程：純粹就是美語環境。

柴：純粹的英語學校，大陸也是一樣，大陸有許多從幼稚園開始就學英語，可是說實話，學了都是白學，真的，學完以後沒用的，為什麼？因為他先學英語，他並沒有學漢語拼音，大陸不是用漢語拼音嗎？到了小學，他要學漢語拼音，那就麻煩了，字母都差不多是拉丁字母，他不得不把英語甩掉了，那就又學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是認字非常有用，在小學四年級以前，可以說漢語拼音起了作

用，但是到五年級以後就完了，慢慢就忘了，最後就搞亂了。

程：會不會因為打電腦要輸入的關係，所以有的音其實對他們來講是個幫助？

柴：對！現在又不一樣了，打電腦也有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會好一點，丟掉得慢一點，有時候還能用，像我當過中學語文老師，所以我的漢語拼音，基本上還可以，這對我打電腦還比較有些幫助。現在像我的編輯室裏面，他們一些畢業的碩士生，都不用漢語拼音，而是用「五筆字型」或者叫什麼「陳橋」，他們都打這個，也許他們小學學漢語拼音，到了大學早就忘掉了。

程：現在在臺灣路標、地名跟世界接軌，就是要認識中國人的檢索資料，或者是中文書籍都還是要靠漢語拼音，我們老的拼音是用威妥瑪系統 (Wade-Giles Romanization)，就是我們傳統說國音第二式，所以拼音這個東西，我們還是得要學。

柴：因為這個東西總是有它好的方面，我們學它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看中國語言文字，它本身也有很強的文化內涵，這是我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你不要覺得好像學漢字很痛苦，花費很多時間，但是你在花費很多時間當中，你也學了很多其他學不到的東西。

車：講到這個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我今天報告龔橙 (1817-1878) 的時候就提到，龔橙曾經當過威妥瑪的秘書，並且還教他中文，所以他那套拼音系統，會不會跟龔橙有關係？這個倒很有趣。

柴：當然，今天你提出來龔橙，我是很感興趣，倒不是因為大陸前些日子為了到底是不是他引了外國人燒圓明園、是不是漢奸？有過辯論。而是，實際上我們對一個人的研究，我始終覺得我們做文學研究也好，做政治學研究也好，其他學研究也好，一定要全面掌握這個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的老師專門講這個東西，你不能忽視，忽視以後會犯很大的錯誤，很片面的錯誤，過去我們就講評一個人的文學作品，要看整個的作品、所有的作品、還要看這個人一

生的經歷，不能看他某一件事情。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給我舉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的〈論詩絕句〉有評杜甫(712-770)的一首，我們講杜甫詩律是很細，大陸講杜甫是現實主義的詩人，很注意音律，可是我的老師就跟我講，你們讀過一首詩很有名的〈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並序〉，他說你們讀讀它的平仄是什麼？「昔有大娘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把它的平仄畫起來，「昔有大娘」都是仄聲，「公孫氏」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這就已經很荒唐了；下面更荒唐，「一舞劍器動四方」，仄仄仄仄仄仄平。這是杜甫寫的詩，我的老師就開玩笑了，杜甫寫得這麼差的詩也沒有人敢批評他，為什麼？因為他是「詩皇」，詩的皇帝。當然我們並不是因為這一句、這一首詩，我們就否定杜甫在詩歌的地位，但是我們要知道杜甫也有很不合平仄的詩，你不要把他誇張百分之百就是好詩。過去大陸就是喜歡學俄羅斯引進來的文學理論，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杜甫是現實主義的詩人，李白是浪漫主義的詩人，實際上李白他是寫了很多酒啊、比較浪漫的，這肯定是他性格一個主流方面，但是李白也有很多現實主義的詩；杜甫詩沉鬱、頓挫，但是杜甫沒有浪漫主義的詩嗎？不，杜甫也有很多浪漫主義的詩。

車：我看安旗的書，他研究李白，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感想，我覺得他蠻像唐吉訶德的，就是很想要把自己的才能貢獻給國家，所以晚年會去應永王璘的招，最後還差點被處死。

柴：李白他很想當官，他認為自己有才氣可以當官。

車：他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他想奉獻出來。

柴：但是實際上他的政治能力很差，所以他根本辨認不出永王璘謀反的性格，他投到永王璘那裏，完全是錯誤的，所以人家講得難聽一點是「活該」。我在做研究生的時後，曾經寫過一篇〈駱賓王散論〉，因為過去對駱賓王(619-687)的評價很高，駱賓王討武則天(623-705)的檄文寫得多漂亮，文章是很漂亮，但是你仔細去看，他為什麼寫？他為什麼被抓起來關到監獄，他有他的毛病，他罵武則天有沒有道理？沒道理！他罵武則天一個中心思想，無非武則天出身卑

微，出身低賤，但是恰恰武則天任用了下層的寒士來當官，她進行了政治的改革，其實這樣的改革對駱賓王是有好處並沒有壞處，但駱賓王是從個人的得失來評論武則天，所以這裏面他的評論是很偏激的，但文章很漂亮，甚至武則天看了以後都很動容，但是他沒道理，道理是錯的。因為我當時要寫邊塞詩的論文，我對他很感興趣，因為駱賓王到過新疆，也寫了一些新疆詩，但是我就把他的詩和岑參(715-770)的詩作比較，我不要光看他的詩，還要看他當時寫的一些文章、寫的一些書信，我就發現，就是唐代的很多官員，他們為什麼到邊疆？他們是為了做官，因為唐代做官有好幾條途徑，一條途徑是當隱士，像李白這樣終南捷徑；一條是「功名只在馬上取」，是要去打仗的，要取得功名，就要赴邊塞。我看了好幾封駱賓王給宰相、給大官的信，低聲下氣，真令人噁心！所以你要看他全部的作品來評論這個人。我們出了一本日本松浦友久的《李白的客寓意識及其詩思》，為什麼我出他這個書呢？因為我看了以後，覺得他還是抓住李白的一些特點，就是李白的客寓意識確實影響他的性格、影響他的創作，這個我們過去關注得不太夠，他做得比較實。所以你分析一個作家，你要看他全部的作品，絕對不能夠以偏概全，任何一個作家都如此，李白的詩如果選他一百首都是很糟糕的詩，就說李白詩很差，那也不是這麼決定的。宋代的陸游(1125-1210)更不用說了，陸游寫了萬首詩，恐怕有九千首都是平庸的詩，但只要他有一千首好詩，還是一個偉大的詩人。

車：時間已經很晚了，明天大夥還要早起幹活，謝謝柴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附錄：柴劍虹先生論著目錄

一、專著：

- 1、《樂府名篇賞析》（合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
- 2、《西域文史論稿》，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1年。
- 3、《絕句一百首》（合著），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2年。
- 4、《中國歷史寶庫》（十二卷，主編），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
- 5、《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 6、《敦煌學與敦煌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二、近期論文：

- 1、〈求真求實會於心——學習啟功先生鑒賞與研究敦煌寫本的體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 2、〈中國馬球史研究序〉，李金梅主編：《中國馬球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漢學研究的兩個隱憂〉，《國際漢學》第7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 4、〈南京棲霞寺飛天形象初探〉，黃徵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
- 5、〈王國維的初期敦煌寫本研究〉，高田時雄編：《草創期の敦煌學》，東京：知泉書館，2002年。
- 6、〈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 7、〈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序言〉、〈敦煌學與敦煌文化的思考〉，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編：《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8、〈對敦煌舞譜研究若干問題的再認識〉，梁尉英主編：《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年。
- 9、〈近十年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新特點〉，《文史知識》，2003年第5期。
- 10、〈普及敦煌文化的開創之作——重新認識《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的歷史價值〉，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1、〈敦煌寫本中的憤世嫉俗之文〉，《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
- 12、〈合度端莊，通達流暢〉，《清華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 13、〈今天，我們怎樣守護敦煌？〉，《敦煌研究》，2004年第3期。
- 14、〈從麥積山石窟藝術看絲路佛教文化特質〉（合著），《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

（取材自「歐亞學網站」：<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f01/629.html>）